

忆任东来教授业委会工作二三事

余成耀

我是2008年10月国庆节以二手房的形式从白云园搬到曲水文华苑小区的。第一天入住，晚上七点多，在我房子的东南方向目测距离约50米的楼下空地上的圆形广场上，来了约100多男女，在跳舞，从七点跳到九点，吵闹不已。搬来第4天，我想去找小区的民间组织反映。

当时从敞开式的小区到这个封闭的小区两眼一摸黑，共有多少人？住了哪些人？是什么组织？无从知道。我和先生在电梯间遇见一位大姐，问她对跳舞的看法，她和我们一样的气愤和无奈，并建议我们找103室的楼长；找到楼长，楼长又让我们去找住一栋的庄工家，说业委会正在他家开会。我们兴匆匆地跑到庄工家，说想见一下业委会主任，出来接待我们的是汪副主任，我们把情况向他反映并把联系方式交给他，请他转交给主任。这是我第一次和第一届业委会的接触。当时还不认识任教授，只是听大姐、楼长和副主任提过。

从2008年10月一直到2009年的元旦，我与跳舞人群交涉过无数次，无论是只身站在一堆人中间，还是在家里推开窗大声呵斥，都无法阻止他们的舞兴。

记得有一天，也是楼下跳舞最疯狂的一次，我打电话给任教授，说你们业委会一定要带领我们把广场要回来。他说，他马上要来5栋，我们就到楼下601室阚女士家等任主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任主任。他告诉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业委会把广场大沟里面的喷泉系统接通，每到7点就放水，这水喷了广场一大半，舞客很恼火，后来每晚来广场，先把喷泉水管给掐掉再跳；水的招数没有管用，业委会派人半夜出动，在广场打了几十个大坑，舞客来了，大吃一惊，报警后，还是跳。舞客坚持认为广场是公共的，可以任意进来吵闹。

种种抵抗办法都无效后，2009年3月7日，业委会决定由物业将大型推土机开进广场，将广场外围的围挡推倒，重新整治。在推土机进来广场作业的时候，任教授一直在东门岗亭指挥推土机工作。我们下楼对他讲，如果有人来闹，我们所有人都出来，支持业委会收回广场的正确决定。记得他当时就说，这广场是我们小区的，他到规划局城建档案馆去查过是红线范围，小区地标上也有标注。听了他的解释，我们更增添了收回广场的决心和勇气。接下来，就是为收回广场开业主大会，我负责跑五栋的每家每户的签字，签完后把表送到物业办公室，看到任教授一人，坐在那里，询问我们5个人到每家上门的情况，然后将表格进行统计。

2009年元月17日，在虎踞路天盾大酒店召开业主团拜酒会，从策划到举办，都是任教授率业委会委员亲自操办。业委会印制了大红请柬，每家每户送到，还统计各家小朋友演出节目的人数。当时，我家孩子六年级，会吹点陶笛，我们家就把这个节目报上去了。业委会

还组织了两辆旅游大客车往返小区和酒店之间，来回几趟，绝不遗漏每一个想去的业主。大家当时素不相识，为了小区的未来参加这个酒会，曲水在这个时期是最团结、业委会最有凝聚力的阶段。到了会场，任教授和业委会成员在会场门口，迎接每一个参会的家庭，每一家都贴上一个即时贴，写明是几栋几零几什么名字。大厅里面两张超长长桌，上面摆放有各种小朋友爱吃的饮料水果和各种零食，看了琬洁衣服上的即时贴，才知道她是任教授的女儿。大会由琬洁主持，任教授致欢迎词，介绍每一个业委会成员，委员表态认捐休闲椅和花木，最后是小朋友的才艺表演。每个上台小朋友还发了文具用品，我孩子还非常荣幸的和任教授父女合影。除了我们业主参会外，还邀请了街道社区、派出所所长民警，和我们一起联欢。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广场收回和团拜会的举办，从此以后对业委会的关注就比较少了。偶尔会在小区看见任教授夫妇，在超市见过他们推着车子买东西。后来，也就渐渐失去联系。

我现在在业委会一年多了，进入业委会后，常常去翻看华侨路茶坊曲水文华业主论坛，上面有十多篇任教授当年当主任时的原创贴子，记录了他那个阶段为了小区自治和构建邻里和谐的心路历程，知道业委会工作的艰辛和无奈。在他去世以后，看到很多任教授的学术届朋友、学生回忆他的文章，都提到任教授在担任业委会主任时曾经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回想那三年他真是为了我们小区的环境建设、民主自治鞠躬尽瘁，俯首甘为孺子牛啊！

在见任教授的最后一面时，卫东和我失声痛哭，说曲水文华业主是不会忘记你的，我们来看你了。

回想任教授的点点滴滴，后悔的是当时毫不知道他的学术地位和身份价值，对小区存在的问题，急切的指望靠他来处理解决，无形中给他带来压力和负担，把他当成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使唤；低调平实，这也正是任教授的伟大之处。知道了任教授的为人和能力，从真理的创造者传播者到真理的实践者，都闪现出他的思想光芒和智慧火花。他的平凡而又出众的人格魅力，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认识他，是我们全家的荣幸。

任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安息吧，任东来教授！

逝者任东来

田波澜

知名国际问题和美国史专家，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东来，于5月2日18时11分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病逝，享年52岁。

著名美国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时，如此评价任东

来：“任东来教授是国内第一个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美国外交史、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等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备受学界推重，在美国宪政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更是独树一帜。”任东来著有《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政治世界探微》、《小视角下的大历史》等；合著有《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等。除了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历史》、《欧洲》、《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发表过一系列外交史、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论文外，他还以“东来”的笔名在《书林》、《读书》、《博览群书》、《南方周末》、《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世界知识》和《联合早报》（新加坡）等报刊上，发表大量的学术评论和国际评论。2002年到2006年间，还为《南方都市报》撰写每周一期的国际评论专栏。

去年1月7日，在为著名美国史专家、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百年诞辰所写的文章的结尾，任东来非常性情地写道：“在祝福老人的同时，我对先生羡慕不已，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那样生活’，‘长命百岁’！”可惜天妒英才，任东来在学术生命进入最辉煌最有爆发力的壮年之时，却因淋巴瘤医治无效而告别人世，这也是继高华教授、青年学者张晖之后又一位与南大渊源颇深的优秀学者的英年早逝。其好友兼师弟李剑鸣说：“东来做美国史比较早，杨生茂（任、李共同的导师）的专长是美国外交史，他开始时是继承杨先生的学术衣钵，研究中美关系史，特别是二战期间的中美关系，2000年以后转去研究美国宪政史，他不仅是自己研究，还带了一批学生一起做，等于是培养了一个研究美国宪政史的团队，做法学、宪政学、政治学的都挺认可他的。后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老师编一个政治文化的丛书，专门给任东来出了一个文集，所以他不仅是在历史学界有影响，在法学界都有影响。”

美国华人历史学家王希教授得知任东来突然去世的消息，极为惊讶，他在追念文章中写道：“一年前我们还一同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年会，在密尔沃基畅谈他的研究计划，并一同在上海大学接待回访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的热情、真诚、细致和充满才智的风趣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来是极为难得的人才，敏锐而勤奋，不仅在美国史、美国宪政和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中有诸多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中国美国史研究学界的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也做出过持久的奉献。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美国研究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损失。”

任东来是江苏宜兴人，1961年5月4日生于长春，1982年、1985年、1988年，先后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和美国史博士学位，是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指导的中国第一位美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起，任东来执教于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起，他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03年起，在南京

大学历史系担任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13年入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协会。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两位学者获此殊荣。

从任东来生前发表的一些纪念学界前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勾勒这位优秀学者的学生时代和学者生涯。在纪念其恩师丁则民的文章中，任东来如此追忆其大学时代的生活：1978年国庆节后，东北师大1978级学生才入学。长春那时很冷，入学时就需要穿棉袄了。从江南考到东北上学的任东来当时只有17岁，是全年级120位同学中最小的一个，室友就叫他小兄弟。当时的任东来对历史谈不上兴趣或爱好，几科高考成绩中，历史成绩最好，于是就上了历史系。比起其他同学，任东来学业上唯一的优势是在宁波的中学学过4年英语，不必再像其他同学那样，从ABCD开始学起。同样，就是因为这个优势，让他有幸跟丁则民开始学习美国史，没有想到这一学习最后演化为任东来终身的事业。回首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活，任东来生前曾如此描述：“1978级同学，特别是文科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主体是所谓老三届（1966-1968年间高、初中学生），这些人中不少是同学中的‘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在他们面前，我等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小字辈实在是白丁一个，相形见绌。于是，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为此，古代的典籍学过一些，但大多似懂非懂；马列经典啃过一点，但基本上只是皮毛。那时，时髦的近现代西方名著是不能不涉猎的，但记住的也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术语概念，惟有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挑战-应战’理论还牢记在心。”在研读《傅雷家书》、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等名著的过程之中，任东来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也从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中吸取了用来研究美国史的养分。

1982年秋天，任东来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跟杨生茂教授读美国外交史方向的硕士。一到研究院他就傻眼了，学校居然寄人篱下，在西郊的十一学校里，食堂是临时的板房，宿舍是六人一间，导师又不在身边。这让期待很高的任东来非常沮丧，并在给大学老师丁则民的信中流露出这种情绪。丁则民及时回信，宽慰他，要他多想北京和社会科学院的大环境，这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相比的。这坚定了任东来在社科院求学的信念。作为一个积极探索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年轻学子，任东来总是追问学术何为的问题，成名后的他曾坦然追溯这段心路历程：“学术何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彷徨之际，无意中翻阅到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的长序，才知道他老人家年轻时也有如此疑惑，并最终在学术的实践中发现，学术的目的就是求真而非求用，‘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原来，学者的职业目标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正是这一豁然开朗，奠定了其一生专业学者的自我定位和职业生涯。

从任东来为前辈学人所撰写的纪念文字中，我们可以窥察到他肯定的是什么样的学术生活和生命价值。在追念其导师杨生茂教授的文章中，任东来相当肯定一种民主而自由的学术

生活，他说杨教授“一向主张进行讨论和以对话为主的教学方法，而且把对话上升到培养学术气质和精神涵养的高度。他说：‘对话不仅出于活跃思想、发展学术、培养良好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德育的好方法。’在杨生茂看来，‘对话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作风，一种待人接物的民主的气质和内涵修养，非经长久磨炼而不易得其中三昧’。针对一些学生被授课老师特别是外国老师牵着鼻子走的现象，他甚至认为，这样‘被动地听课，是产生武断和片面的渊藪。思想附庸是政治附庸的先导’”。这些日常学术生活中的片段式的说法和主张，却深刻地影响了任东来自己在学术生活中的选择。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副主任蔡佳禾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他开朗、随和，学问做得很认真，在教学当中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理念，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和学生打成一片，主要上中美关系史、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冷战史等课程。”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胡晓进是任东来的弟子，2001年考到任东来门下攻读研究生。在胡晓进的记忆中，任东来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的办公室总是向学生敞开，如果学生过去的话，他会乐意和学生聊天，聊学问、人生和书籍等。胡晓进告诉早报记者，任东来指导学生的方式，第一是和学生谈话，第二是改学生的稿子，即使不是他指导的学生，如果让他改稿子，他也会认真地改，认真到每一行都会有改动。胡晓进一开始翻译的文章和论文都被任东来改过一到两遍以上，“任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学生发文章花钱买版面这种事他是绝对不允许的，他觉得这有辱斯文，他说他每一篇文章，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是拿稿费的，这是他非常自豪的地方。”

据李剑鸣回忆，任东来博学多闻，知道的东西挺多，他自己不研究的东西，和别人聊起来，能提供很多的信息，知道很多情况，也掌握很多材料。有一回去武汉开会，任东来专门给李剑鸣带了两本很有价值的书，而李剑鸣是做美国早期史的，跟任东来的研究领域相隔比较远。有时候别人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他也会介绍很多的资料、材料，帮助他们做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旭和任东来曾同在东北师大求学，据他介绍，任东来的父母是吉林农业大学的教授，他心智成熟较早，知识面也比较广。在学术圈里，任东来善于交往，因为知识面广，和各个领域的人交流起来都很容易，很能谈到一起，在一些聚会中，只要有他在，就不会冷场，而且谈的都是些正宗的学术问题，不会说八卦，不闲扯。谈及任东来为何从研究中美关系史转向研究美国宪政史，王旭对早报记者分析说，大致在2000年前后，任东来觉得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里的人有些鱼龙混杂，因为有一些是做中国历史的，还有很多是外文能力不强的，也无法很好地阅读外文资料，于是就利用中文的资料来解决问题，治学严谨的任东来对此很不高兴，于是转向做美国宪政史。由此可见任东来的学术个性和学人性情。

李剑鸣告诉早报记者，任东来是去年7月查出患上淋巴瘤，今年过年的时候病情开始恶

化。刚查出病时，任东来还很乐观，说自己活到八十岁没问题，病情恶化后仍觉得再活三五年不成问题。他的妻子、南京大学外语部吴耘教授也说，后来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任东来求生欲望很强，仍以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最后，他觉得很痛苦。他说自己虽然有遗憾，但也很欣慰，因为太太很贤惠，女儿很能干，学生们也很有出息，但他不希望外地的朋友和学生都来看他，因为那样的话，他很痛苦，朋友和学生也很痛苦。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的追忆，则还原了任东来教授去世前的情景。前天下午杨玉圣、李剑鸣和张成明律师一起去看望任东来，任东来仰躺着，眼睛闭着，喘着粗气，很虚弱的样子。当听说他们来了时，立马睁开眼，很欣慰的表情。虽然说话很吃力，任东来仍叮嘱李剑鸣和杨玉圣两位同仁要“要注意锻炼身体，别太累了”，说自己“没有想到这么快”。“说这些话时，他思路通畅，吐字清晰，刚正坚毅。”杨玉圣说，他握着任东来的手不愿意放开，一丝丝悲凉涌上心头，想着哪怕再延长两天，即5月4日，就是任东来52周岁生日了，也是任东来的恩师杨生茂先生逝世的日子。

可是，任东来还是匆匆西归。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上午9:00在南京市殡仪馆新馆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大、上海社科院等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同仁，都聚集在南京为任东来送最后一程。

（原载《东方早报》2013年5月4日第14版）

爱管芝麻事的大学者

——任东来教授和他的人生追求

黄昉芑

要让每个人都笑着回忆自己并非易事，但这事儿发生在任东来的身上，并不算奇特。尽管在讣告上，南京大学将他称为“知名国际问题和美国史专家”，尽管贺卫方、华生、徐小平等不同领域的翘楚都在微博上对他表达了哀悼，可他在小区业主委员会里的哥们儿姚卫东思忖半天，总结说：“任老师啊，就有点像个小孩”。

女儿任琬洁印象里的爸爸也“简直是个大哥哥”。他爱玩好动，每个周末都闲不住要出门去。小时候，为了培养女儿的竞争意识，任东来自愿降格为女儿的竞争对手。他们让妈妈当裁判，每天比谁得的小红旗多——任教授的小红旗数目被女儿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有一回，他还想跟女儿炫耀自己的成就：“在美国问题的研究上，爸爸也算得上是国内一流的”。琬洁望望这个自家最爱玩爱闹，晚起早睡的成员，料定他是在吹牛。

2013年5月2日傍晚，身患淋巴癌的任东来一手攥着妻子，一手牵着女儿，平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晚，邻居姚卫东闻讯赶到了他的办公室，帮着整理纪念册，这才发现，和自己一起在小区里换了物业公司、帮着大伙儿解决种种疑难问题的兄弟，竟是新中国第一个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在不到52年的人生中，写过11本专著，221篇论文，还有6本译著与上百篇专栏。

回家之后，他发觉微博上媒体、大V也都在纪念楼上的那位兄弟。很多网友感慨说，就是任东来的一本《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开启了他们对宪法的理解：宪法的重要性在于民众对其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来源于宪法能否限制政府、约束官员、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

“乖乖，没法形容那震撼！”姚卫东说，“他原来是这么一个大学问家啊！”

但在心里，姚卫东没法把那些文绉绉的字句和自己熟悉的爱聊天、大嗓门的“任老师”联系起来。“我总是习惯叫他‘任主任’、‘任老师’。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那么一个大学者，谁家有事儿都找他”。

他还记得在小区业主聚会上第一次见到任东来，对方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这个自称是“南大老师”的中年人常常敞开了嗓门哈哈大笑，也总是精神充沛，特别能跟人聊，“说到什么都特别好奇”。知道姚卫东是部队里出来的，当过武警，就抓着他求科普：“武警具体是干什么的？”

那时他们居住的社区还“乱七八糟”，里面的广场不知怎么被建成了开放式，谁都能来，每家多少都有丢了电动车或是电瓶的事儿。物业公司忙于收费，也没正经管理。傍晚，附近几个小区100多位大爷大妈们都在居民楼下跳集体舞，呜啦呜啦的乐声响彻小区里仅有的五栋居民楼。

“我女儿要是中考高考，我也只能点着鞭炮跟他们拼命去”，回想起来，姚卫东忍不住感叹：“任老师真是有办法”。

只有任东来想到了去找合乎法理的依据：规划局的文件证实，当初楼盘规划时，广场是被划在小区内的。这下，业主委员会便有足够的理由，绕着广场新建了围墙。

这位在北方生长的江南人似乎从来都不喜欢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去挤“大路”。他总是走在自己心仪的羊肠小道上，这些路未必是最安稳的，也未必最有利——一般人所关心的物质生活、职称高低，几乎都不在任东来要忧虑的事情中。他就选自己觉得有趣的路，亦因此，他的日子总是过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

“东来不会有我那么多的忧虑”，南大历史系的另一位教授于文杰在谈起自己这位同事时感慨道，“他不会去筹谋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他是个纯粹的学者，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方面。也因此，他有点吃亏”。

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里，历史学者任东来的研究跨越了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宪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当对美国外交的研究热闹非凡时，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复杂的美国宪法；而在美国国内，闪光灯聚焦下的白宫与国会山才是明星，可任东来偏偏选择了一旁门庭冷落最高法院。他对那里有着满腹好奇。

他的书里引用过美国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不无偏见”的断言来解释自己研究领域的“神奇”：“在其他国家，权力之争由武装部队来解决；在美国，权力之争由法律家组成的大军来解决”。

这不是第一个“任东来式”的别致选择。“他总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独一无二的”，吴耘说。

在《美国宪政历程》一书的后记中，任东来强调了这次写作历程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虽然，旅途中的一个注释，也许都是他与合著者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之后推敲出的结果。当听到女儿的同学说读了这本书很受启发之后，他得意极了。

另一桩让他得意的事儿是：他的论文，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是“拿稿费的”。

过着如此称心如意的日子，这学者甚至曾一本正经地跟女儿感叹过，某某同事要去“做官”了：“真是可怜啊”。

若要追根溯源，这种独特风格在17岁的任东来初入大学时便现了端倪。在东北师大的历史系，这个带着眼镜的文弱小青年英语最好，不时“偷听敌台”，给同学们带来惊世骇俗的“域外奇闻”。譬如当时美国最流行“婚外同居”和“试婚”，据说当年，大把男光棍被这话惊得夜不能寐。

读研时，为了写论文，这个毛头小伙读英文资料，找原始档案，还特意去拜访了原国民党驻印度远征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

妻子吴耘还记得，在南开大学的一场学生舞会上，自己初遇了任东来。这位国内第一个美国史博士生当时正埋着头，在人群周围使劲儿地扫地，一个女生不满地对他喊：“你干嘛？搞得到处都是灰！”

最后一支舞曲的时候，扫地生请吴耘跳舞，很聪明地问她“你是不是某某法语班的”，姑娘这才想起了班上某个总坐在第一排以英文发音读课文的同学：哦，原来就是那个法语最差劲的男生啊！

后来，老朋友陈伟说，任东来当年那是“面对美女，闹单恋”，“上课难以集中精力”，因此才把法语学得一塌糊涂。不管怎么说，口语最烂的小子还是追上了全班法语最好的女生。

也是这个陈伟，见识过大嗓门任东来和导师杨生茂在一起的模样：“从国际形势到外交政策，从读书心得到治学体会，从最近淘到的旧书到国内外学术界最新动态，乖乖，侃了个天花乱坠，天翻地覆，日月无光”，而杨老先生呢？“和蔼可亲，洗耳恭听”，不时还笑眯

眯地点着头。

见到这一幕同宿舍友们笑曰：“任东来是杨生茂的导师”。

多年后，琬洁在美国读书，爸爸去看望时，三下两下就跟她的寄养家庭聊上了。当时他正研究美国公民的持枪权，一通谈天说地之后，老爸兴冲冲地来跟女儿报告，他参观了这家人存放枪支的房间：“他们家有5支猎枪！什么时候没准能一块打猎去呀。”

能静听东来侃大山的杨生茂先生，是国内世界近代史与美国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他与任东来在大学时的恩师丁则民一样，都是上世纪40年代从欧美归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文革后考入大学的任东来，在学术与为人上深受他们两位的影响。

然而，完成学业后，他没有投奔自己的任何一位导师，而是选择了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这意味着他不在任何一个学术梯队中，也意味着他可以时时读到丰富的、与国外同步更新的藏书，随心喜好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职称都是教授中的最末一级，后来好不容易才升上了第三极。但他的著作引起了外界的赞叹。2013年，任东来入选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协会。迄今为止，国内仅有两人获此殊荣。

然而无忧无虑的任老师却还是当了一回无名无利的“南京市鼓楼区奥巴马”。当初大家推举任东来当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主任，（那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姚卫东说），他“特别有义气”，就扛过了这个远比奥巴马从前在芝加哥贫民区的工作更艰难的担子。接着，一步步定了计划，带着业主代表走访了十几家应征的物业公司，印刷了选票，抬着投票箱挨门挨户地请业主投票。

更换物业那天，原公司死活不肯走，当地派出所都派了一队民警来盯着。而任主任领着一些对审计、建材懂行的业主，跟对方就种种款项支出一一核对，摆事实讲道理，大半夜地楞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平静撤退。

任东来爱狗，一有空就带着家里的宠物狗下楼溜达，总会跟遛弯的邻居们聊聊天。琬洁经常下楼找爸爸，发现狗狗都趴在地上累得直喘气了，老爸还在与人热火朝天地聊着。

小区里有个年近八十的老太太，特别喜欢金银花。有人嫌她在花坛种花，破坏了小区原有的绿化，把她的金银花都拔了，老太太伤心不已，找上任主任要求公道，用吴语方言诉冤屈，任主任不管有多忙，动不动就得听上大半个小时。

那时候女儿还不懂啥叫“业委会”，但已会整蛊爸爸，把他的手机铃声改成“业委会来啦，快接电话”，不论老爸怎么哀求，都不肯帮他改过来。

那几年里，任东来思索着业主共同管理小区的议程与问题，常常睡不着觉。跟做学术一样，他什么细节都想做到完美。没有人想到，在人前总是精神百倍的他，健康状况已经亮起了红灯。

姚卫东说，任主任这样无私奉献，不就是雷锋精神吗？他不晓得，2009年，在怀念师长李慎之的一篇散文中，任东来回忆说，李慎之70年代末在日本访问，见到妇女跪在地上一丝不苟擦洗地板，忍不住落泪：“我不是为日本妇人的苦难而落泪，我是为我自己的民族失去了这样的敬业精神而伤感。”

“任东来写李慎之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这也是他在实践的。他熟知历史，尤其美国建国以来法治的经验与走过的弯路，就用通俗的语言写出来让大众读到；他了解很多国际上的规则与事例，就想把这些经验引入自己的小区，为把家园治理好尽心尽力”，妻子吴耘是这么理解丈夫的，“他不是那种会很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祖国就是怎么怎么好’这样的，但他会去尝试，尽自己的全力让周围的一切变得更美好。这也许是一种天真，也许是一种理想主义，但这是他一生去践行的。”

20多年前，任东来从老师那里第一次听说美国许多教授在退休后去博物馆作义务讲解，特别触动，后来也对太太说，等我退休了，要去博物馆做义工。

但在52岁生日前一个月，他最后一次回家，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中键入了“南京树葬”这两个关键词。琢磨了一阵之后，他还是有些失望：南京的树葬还不规范。妻子忍着泪水别过头去，而丈夫抚摸着她的头发与眼睛，温和地用自己的方式对她告别：“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完美的”。

他看上去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结局：“我这辈子活得很有尊严，如果疾病不治，我也能和李慎之、丁先生、杨先生去天堂聊聊天了”。

他说，天堂会是图书馆的样子。

去世两天以后，任东来的葬礼在南京市的新殡仪馆举行。他的朋友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他送行，南京大学叫来三辆大巴也没法把大家都送去。小区里的居民们则自发拼车，组了一个车队去跟任主任道别；吊唁的人很多，他们都排在了告别厅的外面。葬礼结束后，任夫人注意到遗像正下方放着一只五十公分高的花篮，是用金银花编织而成的。

那是老太太一早起来，采摘了金银花枝条编的。如今那小区中，成片的金银花像绿色的波浪一般缠卷在围栏上，生机勃勃，好看得很。

（本文曾摘要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29日第10版）

著名学者任东来的生命之火（附吴耘老师评论）

伏自文

继今年初邓正来、张晖相继离世后，又一位学人英年早逝。著名国际问题和美国史专家，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东来，于5月2日在南京病逝，享年52岁。

很多人通过任东来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认识了美国宪法史。本书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两百余年25个重大案件审判的再现，向读者展示了一部形象的美国宪法史。这幅历史图画在细节刻画上栩栩如生，评论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对于相关制度演进过程及其历史和现实的意蕴给予了深刻的揭示。

从任东来生前发表的一些纪念学界前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勾勒这位优秀学者的学生时代和学者生涯……

任东来是江苏宜兴人，1961年5月4日生于长春，17岁读大学，21岁读研究生，27岁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他成为美国史泰斗杨生茂教授指导的中国恢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之后第一个美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起，任东来执教于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起，他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03年起，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13年入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协会。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两位学者获此殊荣。

任东来的美国史研究同仁、好友杨玉圣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东来最早的专业领域是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1995年出版）旁征博引，论证严谨，自成一家之言，迄今仍是代表中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的一部优秀之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讲求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的美国史专题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政治世界探微》和《小视角下的大历史》，集中反映了东来到那时为止对有关问题的既有历史深度、又有人文关怀和独到学术视野、文化品位的专题论文和评论。之后，东来的学术重心自觉地转向美国宪政史特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史的研究，并与其同事或学生合作出版了在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反响的《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关于美国十大法官的合传也已接近尾声。东来还是一位少有的热心公益并身体力行的中年名家，这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当今，尤其难能可贵。他走出书斋，把宪政—法治与民主的理念用于其所在小区的业主自治实践，在其小区发起召开了业主大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小区业主维权。以偌大的中国，在数以百计的美国史研究者中，似乎还只

有东来和我曾经以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投身于小区业主自治实践。”

作为一个积极探索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学者，任东来总是追问学术何为的问题，成名后的他曾坦然追溯这段心路历程：“学术何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彷徨之际，无意中翻阅到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的长序，才知道他老人家年轻时也有如此疑惑，并最终在学术的实践中发现，学术的目的就是求真而非求用，‘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原来，学者的职业目标就是‘为学术而学术’！”

从任东来为前辈学人所撰写的纪念文字中，我们可以窥察到他肯定的是什么样的学术生活和生命价值。在追念其导师杨生茂教授的文章中，任东来相当肯定一种民主而自由的学术生活，他说杨教授“一向主张进行讨论和以对话为主的教学方法，而且把对话上升到培养学术气质和精神涵养的高度。他说：‘对话不仅出于活跃思想、发展学术、培养良好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德育的好方法。’在杨生茂看来，‘对话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作风，一种待人接物的民主的气质和内涵修养，非经长久磨炼而不易得其中三昧’。针对一些学生被授课老师特别是外国老师牵着鼻子走的现象，他甚至认为，这样‘被动地听课，是产生武断和片面的渊藪。思想附庸是政治附庸的先导’”。因此，任东来指导学生的方式，第一是和学生谈话，第二是改学生的稿子，“任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学生发文章花钱买版面这种事他是绝对不允许的，他觉得这有辱斯文，他说他每一篇文章，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是拿稿费的，这是他非常自豪的地方。”

任东来去年7月查出患了淋巴瘤，在其学术生命进入最有爆发力的壮年之时，告别他已入佳境但未竟的学术事业离开人世。不少网友由此联想到今年刚刚离世的邓正来、年仅36岁的张晖以及去年和前年分别离世、不过五十几岁的高华和蔡定剑。我省知名历史学者潘先林教授在获悉任东来离世的消息后，用三个“无休无止”来总结国内学者难以承受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无休无止的课题申报、无休无止的评审、无休无止的检查……还有房子、车子、票子、面子，方方面面的压力。作为一个资源和政治高度联姻乃至一体的社会，知识分子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要么转行、要么兼职，要么就只有在学术中迅速燃烧自己……”

（《云南政协报》2013年5月10日）

吴耘老师评论

刚看到伏自文先生的文章，最后一段这样写到，“我省知名历史学者潘先林教授在获悉任东来离世的消息后，用三个“无休无止”来总结国内学者难以承受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无休无止的课题申报、无休无止的评审、无休无止的检查……还有房子、车子、

票子、面子，方方面面的压力。作为一个资源和政治高度联姻乃至一体的社会，知识分子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要么转行、要么兼职，要么就只有在学术中迅速燃烧自己……”

我个人非常赞同潘教授的观点，可是我想说的是，东来绝对不属于这种情况。东来在申报、评审方面并未觉得很大压力，他的心态很好，能上就上，不行下次再来。他从来不去刻意争取什么，名利好像都是别人的事。对于自己的宪政研究，他有一股发自心底的激情，这种激情让他在学术世界尽情畅游，每次的畅游都是“愉快的精神之旅”。因而，他对生活无比热爱，喜欢旅游，养花，养狗，广交朋友，永远是个阳光大男孩。他热心投身公益事业，在小区业委会一干就是四五年。但是，小区管理不同于学术研究，方方面面的协调千头万绪，而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心里总是牵挂小区，常常夜不能寐。最后在 2011 年因健康原因，辞去了业委会主任，但之后还是关心小区的建设。

怀念小师妹张宏

孙群郎

前不久来到厦门，我才得知我的小师妹张宏已经不幸离开了人世，这一惊远远超过了上一惊。没有言语，没有泪水，没有悲声，甚至没有表情，只有傻呆呆的茫然！小师妹，你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去了？你还很年轻，你还应该拥有自己美好的生活和蓬勃的事业，你还应该拥有你所该拥有的一切，你竟这样默不做声地悄然离去了。

同样是在厦门，仅仅三年前的厦门，美国史研究会的年会上，我与张宏小师妹见面了，那是好多年之后的重逢，她仍然像从前那样称着“师兄”，但却不似从前那样活泼，那样张扬，而是声音中多了几分绵软，几分甜美，神情中蕴含了更多的沉稳与祥和。我当时知道她患上了癌症，心里为她担忧。小师妹，是不是人生的阅历和生活的磨难使你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使你走向成熟走向坦然？谈话中，她仍然不时地说一些关心师兄的话，让人心里暖烘烘的。没想到，仅仅时隔三年，小师妹就撒手人寰，决绝而去，那次厦门的相见竟然是我们的诀别。仍然是没有言语，没有泪水，没有悲声，但内心却是无限的悲痛和怀念。

那是1991年的秋天，张宏、王玉华、郭立明和我一起考入丁则民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我年龄最大，长张宏四岁，称大师兄，张宏最小，称小师妹。张宏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姑娘，性格豪爽、活泼、本真、善良。她说话声音洪亮，笑声爽朗感人，办事雷厉风行。由于我长她几岁，自然也经常摆师兄的谱，有时也跟她开个玩笑。可惜的是，我自小就不会开玩笑，经常惹得她十分光火，把我这个师兄数落成个落汤鸡，淋淋漓漓，倒也痛快。不过，我不怪她，更不恨她，甚至倒有几分喜欢这个小师妹。她就是那么心无芥蒂，直爽本真，雨过天晴。张宏也很有同情心，每当我出现了生活中的困苦，她就表示关心，或者我做的不好，挨了老师的斥责，她也会报以同情，说几句安慰的话。

张宏为人豪爽，敢爱敢恨。记得大概是1992年暑假，我和室友玄伟东、郑先武，还有张宏和教育学院另一名女研究生一起去长白山旅游，线路是从长春经昌图到长白山，随后过牡丹江、古渤海郡王城东京城，绕道哈尔滨，绕了一大圈回到长春，历时近半个月，玩得忘乎所以，不亦乐乎！张宏就更加开心了，因为一同出游的我的室友之中有她心仪的白马王子。

研究生毕业以后，由于各自奔忙，也就很少进行联系，我也不时听到她的消息，读到她的文章，还能记起我们师兄妹的一些回忆。厦门年会一见，我发现了她的巨大变化，我竟诧异人竟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岁月的刻刀竟能将一个如此本真活波的女孩雕琢为一个如此

温文尔雅、恬淡持重的具有长者风范的人。

张宏小师妹，你的英年早逝仅仅如同别人说的是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损失吗？你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伤痛和哀挽，爱人的、孩子的、父母的、朋友的、同事的……同样，还有你留给师兄的，久久的哀伤，不尽的怀念！

愿小师妹在天上如同在地上一样永远快乐，永远年轻！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 OAH 合作信息两则

经我会外事小组评审和 OAH 确认, 辽宁大学石庆环教授、南开大学董瑜博士和厦门大学李莉博士获准参加 2014 年 4 月在美国亚特兰大举办的 OAH 年会, 并在会后展开短期研究。

我会与 OAH 商定, 2014 年夏季研讨班现已确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 时间是 6 月 2-20 日, 共三周, 研讨班主题为“美国治史人才的培养、美国宗教史与环境史”。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致杨麦龙先生家属唁函

杨麦龙先生家属:

惊悉杨麦龙先生不幸逝世, 十分悲痛。杨先生长期从事美国史研究, 多有建树。杨先生是我会资深会员, 长期支持研究会工作, 曾承办第六届年会, 并为《美国史研究通讯》的出版慷慨解囊。

在此哀伤时刻,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全体会员向杨先生家属致以最亲切的慰问, 望节哀顺变。

杨麦龙先生永垂不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14 年 1 月 5 日

OAH 年会观感及访学经历

王睿恒

2013 年 4 月，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和美国历史家协会（OAH）合作组织的中国学者访学项目（China Residency Program）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顺利进行。这一项目作为 AHRAC-OAH 整体项目的一部分，每年资助三名中国年轻学者参加 OAH 年会，并于会后前往指定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为期 10 天的访问。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为该项目 2013 年度的受益人之一，前往旧金山旁听 OAH 年会，并于会后访问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经历研究所（Institute on World War II and the Human Experience）。

在 4 月 10 日开会之前，我利用旧金山市的地理位置之便，提前一周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Hoover Archive）查询资料。胡佛档案馆与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国家档案馆主要存放政府机构相关档案，而胡佛档案馆专精于私人档案收藏。这里大部分的馆藏系列都以人名命名，如史迪威、陈纳德、居里的私人文件集都是这里的重要馆藏。值得注意的是，胡佛档案馆还将珍藏的海报全部数字化放到网上，建立了政治海报数据库（网址 <http://hoohila.stanford.edu/poster/>），这为海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二战时期美国对华宣传，需要收集国共两党及公众对美国战争宣传的反馈，所以胡佛档案馆中珍藏的蒋介石日记、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和国民党的材料都对我的论文很有帮助。但是这部分材料不能拍照和复印，只能够手抄或者输入电脑，故查阅速度比较缓慢。而宋子文文件当时正在数字化过程当中，没有开放，非常遗憾没有看到。建议查档者前往档案馆之前先写信询问档案员，以确定所需档案在查阅期间是否对外开放。

4 月 10 日到 14 日，我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返回旧金山市中心参加 OAH 的年会。这次前来参会的中国学者和研究生中，除了该项目资助的另外两位学者——厦门大学的韩宇老师以及东北师大的吕洪艳老师——之外，还有北大的王希老师、正在斯坦福访问的何慧老师，以及在美交流的北大美国史博士生于留振、杜华和东北师大的博士生伍斌。如此一来，中国学者在 OAH 年会上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影响力。虽然我们还没有机会在会上发表论文，但是我想，未来总有一天可以在 OAH 的会议上听到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声音。

熟悉美国会议情况的王希老师向我们解释说，OAH 的论坛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全体大会，它将邀请著名学者就最受关注的话题进行发言，如 4 月 11 日以“为自由而奋斗”为

主题的全体大会，就是为了纪念华盛顿大游行 50 周年和《奴隶解放宣言》发表 150 周年而专门设置的。第二种是反映美国史各领域最新教学趋向的小组讨论，如我曾参加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的专题讨论。这一场小组讨论以外交史领域的文化转向为主题，邀请文化转向的先驱——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 Emily Rosenberger 教授——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讨论文化转向的特点，以及如何在教科书的主流叙述中融入这一学术新动向。第三种小组讨论最为专深难懂，但往往也让听众受益最多，它主要围绕某一最前沿学术领域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例如我旁听的“认同的影像：通过视觉和物质文化的棱镜透视种族特征、种族和公民身份”这个专题小组，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Mae M. Ngai 的主持下，讨论如何通过照片、绘画等影像资料研究美国国内不同的族裔对他们自身公民身份的认知和理解。这三种形式的讨论会从不同方面满足了学术群体的需求，与会者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内容旁听和参与讨论。

会议举行过程中，我们得到了 OAH 国际委员会的热情接待。哥伦比亚大学的 Alice Kessler-Harris 教授、伯克利大学的 David Hollinger 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 Kurt Piehler 教授以及王希教授都为我们三人赴美做出了诸多工作，我们心怀感恩。特别是再次见到 Hollinger 教授让我非常惊喜。2009 年“北京论坛”召开时，我曾经是接待 Hollinger 教授的“小导游”，带着他和伯克利的 Carla Hesse 教授游览天安门、故宫和景山公园。后来 Hollinger 教授回美后，还曾寄给我几本英文书，鼓励我好好学习美国史，令我感动不已。没想到四年之后，我们竟然在 OAH 的年会上再次相见，而且实际上是他参与组织的这个项目把我带到了旧金山，这种巧合着实令人感慨。同时也让人切实地感到中美史学界不断拉近距离。

会议结束之后，我只身飞往佛罗里达的首府塔拉哈西（Tallahassee），对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系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Kurt Piehler 教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经历研究所的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我与他的研究生以及历史系的同僚见面。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系以军事史和欧洲史研究见长。二战研究所珍藏的 6000 种资料为海内外学者研究二战史提供了宝贵的档案资源，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二战时期美国士兵的生活和战争经历。我在 Piehler 教授的研究生课上做了主题发言，介绍我的博士论文及主要观点，得到同学们和几位老师诸多诚恳的建议和意见。

此外，Piehler 教授的一名学生还带我参观了佛罗里达州议会，并向我详细讲解了州议会的工作机制。当时恰逢两院开会期，首府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开会前，会将当天会议议程对外界公开，而本地的电视台以及首府大厅里密布的电视机，将实况转播开会时议员辩论的全过程，从而保证会议的透明度。无论是外国游客还是工作人员都可以经过安检进入会场旁听。只见明亮的白色双层大厅里，形形色色的说客们三五成群围着一位议员低声交谈着，两侧的电视机前坐满了正在认真倾听和做笔记的工作人员。作为一名局外人，我有些局促地在这种繁忙的政治氛围中穿梭而过，仿佛可以嗅到空气中的火药味。如果说，

OAH 年会和 FSU 的访问让我在知识层面得到收获的话，那么这次佛罗里达首府之行让我直观地感受到美国的民主政治在州一级层面上是如何运作的。

总之，非常感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 OAH 给我这次出国学习和查档的机会。希望这个项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有机会了解美国学术界的前沿，促进中美学术交流的繁荣。

参加 2014 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年会的经历

魏 涛

一、注册

在美国历史学界，每年 1 月初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都会举办一次年会。2014 年 1 月 2 日至 5 日，第 128 届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届时来自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历史爱好者以及与历史相关的广告商等将一同参加这次盛会。

为了参加美国历史协会的这届年会，我选择了网上注册。打开美国历史协会的官方网站（<http://www.historians.org/>）后，我按照协会提供的注册步骤进行了注册。从登录帐号到最后完成注册，前后只用了几分钟。通过这次注册，我感受到了美国历史协会的专业和高效。于是，我想把自己的注册经历介绍一下。同时，我想把美国历史协会对会议的组织 and 安排介绍一下，以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学习和借鉴。

在参会人员中，既有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也有非历史协会的会员。在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中，既有普通的博士候选人，也有资历颇深的大学历史系教职人员等。在非历史协会的参会人员里，他们既有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社，也有各大学或者非政府组织的招聘工作人员。只要你对历史感兴趣，都可以参加美国历史协会组织的年会。但是，在参加年会之前，你必须遵守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要求，并为自己注册。

为了方便参会人员注册，美国历史协会提供了提前注册（preregistration）服务。对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你可以选择提前注册，也可以到会场注册。如果你要提前注册，你必须在 12 月 21 日之前办理；如果你是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注册费用将是 164 美元；如果你不是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注册费用将是 215 美金；如果你是美国历史协会的学生会员，注册费用只有 76 美金；如果你不是美国历史协会的学生会员，那么注册费用将是 116 美金。

如果你错过了提前注册的时间，你还可以在 12 月 21 日继续进行会议注册。不过，可能要多交一笔注册费用。如果你是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注册费用将是 193 美元；如果你不是

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注册费用将是 244 美金；如果你是美国历史协会的学生会员，注册费用只有 82 美金；如果你不是美国历史协会的学生会员，那么你的注册费用将是 122 美金。

其实，是否参加 2014 年的这次年会，我一直犹豫不决。早在今年的 10 月份，我就收到了美国历史协会 2014 年年会的会议日程手册。由于当时我没打算要参加这届年会，就把会议手册束之高阁了。最近，当我把它重新打开时，发现美国历史协会对年会的组织非常专业，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要在 1 月初举行，但是，早在几个月以前它就把会议的议事日程安排妥当了。等认真把会议日程细读一遍后，我对美国历史协会的专业性深表佩服！考虑到我可以利用参加年会的机会去国会图书馆查找档案，我这才下定决心要参加这次年会。

到底美国历史协会的专业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历史协会分发给其会员的 2014 年年会手册。

打开年会手册后，我先看了看目录。在目录的第二页，介绍了美国历史协会 2013 年的工作成员。在右上角，那里有一幅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工作照片。在第三页，介绍了本届年会的基本议事日程。第四页把美国历史协会历届年会主席的名字都一一列了出来。从 1884 年美国历史协会第一任主席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到现任主席彭慕兰，都一一地列了出来。

为了让参会人员从电影中学习历史，同时也为了方便历史学家利用影视资料进行教学，美国历史协会还将在本届年会上播放电影。在第五页，列出了本届年会上即将播放的历史电影。在这些电影中，有 *Lesbiana: A Parallel Revolution*、*Mutiny: Asians Storm British Music*、*They Call It Myanmar: Lifting the Curtain*、*A Fierce Green Fire: The Battle For A Living Planet* 和 *Peepli Live*。说实话，这些电影我现在还没看过。但是，通过看电影简介，我发现它们主题不一且非常有趣。等回头，我要把它们找出来好好欣赏一番。

接下来，美国历史协会会议手册介绍了本届年会的基本信息。这其中既有介绍年会会议场所的住宿信息，也有参加年会的交通信息。它还简单地介绍了年会会场的地理位置。之后，年会手册介绍了从 1 月 2 日到 5 日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会议组织情况。另外，还介绍了美国历史协会下面各历史分会的小组会议情况。

这届年会共设有三个会场，分别是万豪沃德曼公园酒店（Marriott Wardman Park Hotel）、欧尼肖雷汉姆酒店（Omni Shoreham Hotel）和华盛顿希尔顿酒店（Washington Hilton Hotel）。由于这三个会场都分布在华盛顿特区西北边的亚当斯·摩根（Adams Morgan）地区，所以参会人员可以随时赶场。可能好奇的读者会问，为什么美国历史协会组织方不把年会安排在同一个酒店呢？因为这个会议是一年一度，参会人员之多可能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听我一位参加过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的朋友说，参加 2011 年年会的时候，会场到处是人山人海。我想，美

国历史协会之所以把会场安排在三个不同的酒店，主要是考虑到参会人员太多的缘故吧。为了方便参会人员，在第 21 页到 27 页，年会手册介绍了三个主会场的平面结构图。换句话说，在还未抵达会场之前，参会人员就可找到他 / 她们即将参会的地理位置。

会议手册的第 29 页到 97 页，详细介绍了各小组会议的情况。通过查阅目录，参会人员会发现他 / 她们感兴趣的会议小组报告。同时，参会人员还可以看到各小组会议的标题、主席、会议报告人和评议人等。

为了方便参会人员，美国历史协会也编了索引。在第 98 页，那里有一页专门介绍会议主题的索引。这样，参会人员可以通过查找会议主题关键词来搜寻自己想要的信息。从第 99 页到 110 页，编了一份参会人员的索引。有了这个索引后，参会人员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年会报告人员、评议人、小组报告主席等人的基本会议活动。

为了鼓励参会人员加入美国历史协会，主办方还列举了一份美国历史协会忠实会员的名单。比较特殊的是，这些会员都有 50 年美国历史协会的会龄。从第 111 页到第 114 页，把这些会员的名单一个一个地列了出来。在这份名单上，我发现了许多我熟知的历史学家的名字。他 / 她们分别是 Bernard Bailyn, Natalie Zemon Davis, Carl N. Degler, Seymour Drescher, Jack P. Greene, Gertrude Himmelfarb, David A. Hollinger, Daniel Horowitz, Akira Iriye, Michael Kammen, Stanley N. Katz, Alice Kessler-Harris, John J. McCusker, William H. McNeil, James M. McPherson, Robert L. Middlekauff, John M. Murrin, Dorothy Ross, Carl E. Schorske, William H. Sewell, Edward S. Shapiro, Peter N. Sterns, Gordon S. Wood 等。我统计了一下，这份历史学家的名单有将近 300 人。

在这份名单之后，美国历史协会介绍了协会的图书奖、奖学金和研究基金等项目的申请和截止日期。

美国历史协会也介绍了本届年会上各广告商的各种会展。参加这种会展的主要是各大学机构的出版社、网络数据库和期刊杂志社等。在 116 页，它把本届年会会展的各个会场一一列了出来。在第 117 页，编了一个会展展览方的索引。在 118 页，编了一个广告商的索引。

作为一个有着 127 年历史的历史学家组织，美国历史协会跟各大出版社和广告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会议索引后面，美国历史协会编了一份长达 84 页的彩色纸张广告。在这些广告上，各大广告商纷纷把新出的书籍和杂志等列了出来。为了推销各自的产品，这些广告商还向读者提供优惠券和免运费等各种优惠服务。对广告商来说，通过参加这个年会，可以推销产品。对参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买打折的书籍。对广告商和历史爱好者来说，美国历史协会组织的年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互利互惠的机会。

在筹办一年一度的年会时，美国历史协会所体现出来的专业让我印象深刻。早在年会开始之前，就提前安排好各种会议小组报告的专场。在安排好各种小组报告后，提前两个多月

把会议议事日程邮寄给会员。与此同时，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还可以通过他/她们在美国历史协会官方网站上注册的帐号获取年会的基本信息和议事日程。对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以及非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来说，若他/她们要参加这次年会，他/她们只需支付年会注册费用即可。对美国历史协会来说，它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来筹办这届年会。这不仅方便了参会人员，也节省了美国历史协会相关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美国历史协会年会规模之大，远非普通的历史会议可比。可是，在美国历史协会的筹办和组织下，一切都进行的有条不紊。

二、个人观感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我颇感兴奋。从1月2日早上的第一场到1月5日的最后一场，我场场不落。当然，由于会议安排上的时间冲突，我也错过了好多会议专场。我听了很多优秀的报告，见了许多知名教授，交了许多新朋友。亲自参加这种大场面的年会后，我的学识和见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从来没人在我面前提起亲身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经历。毕竟，在国内教书的教授，很多人没有参加过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经历。2009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就在纽约举行，可惜那时我没参加。说来惭愧，我第一次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竟然是四年半后。我很幸运，在我有生之年可以参加这样的盛会。因为就我所知，我的许多前辈们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盛会。可是，学历史的，尤其是学美国历史的，不参加这样的年会，这怎么也说不过去的。2015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将再次在纽约举行，我将再次参加。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这次参加年会我没有提交论文，也没有在年会上做报告。后来，我才知道，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只接受 panel proposal。而且，提交 panel proposal 的截止日期早在年会之前的十个月以前就已提前结束。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认真准备 panel proposal，很难有机会在年会上做报告。即使你有 proposal，还要找 3-4 个其他的 panelists，以及相关的小组评议人和主席。不然，美国历史协会还是不会接受你的 proposal。对我来说，很幸运参加了今年的年会，因为我知道了美国历史协会运作的基本流程。我想，以后我也会尝试着向美国历史协会提交 panel proposal，并尝试着在美国历史协会上作报告。我的人生还很长，我想我总会有机会走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舞台上做报告的。或迟或晚，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在这届年会上，我认识了美国历史学界的许多大佬和青年学者，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叙述了。

没参加这次年会前，很多时候看书写论文都是单独进行。虽然偶尔也会读到好论文，也会见到牛教授。但是，在这次年会上，我同时见到这些大佬的时候，我会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大佬没有架子，他们都乐于提携晚辈。大佬学问做的好，做人做的更好。在年会上见过大佬后，我觉得我该进一步提高我的学术起点，并好好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了。

三、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职业性

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历史学家们对高中生和本科生的历史教学问题非常重视。1月2日上午，参会人员的会议报告全部以历史教学问题展开。在会上，历史教师们会交流他们在各自大学、社区学院、高中等历史教学经历，并一起分享他们的教育哲学。他们有的尝试着做跨学科的历史教学，有的尝试着通过团队合作来进行历史教学，有的还通过历史教学改革等来探讨相应的历史教学法。在国内，历史学方向的学术会议一直不怎么重视历史教学等问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有的历史学教授学问做的很好，但是他们的历史教学未必优秀。今后开历史类的会议，应多给历史学方向的优秀教育者提供机会，并让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育哲学。这样的话，将大大改善中国国内的历史学教育水平。在高中生和大学本科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上，我觉得这很值得国内的历史教育者们学习。

12点的时候，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会议注册就开始了。凡要参加年会的会员都要在美国历史协会指定的注册中心进行注册，并获得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会徽。由于在参加年会之前，大部分会员都已提前注册，所以大家在电脑上输入会员号和姓名之后，立马就获得了自己的会徽。除去排队的时间外，我拿到会徽的整个过程只花了几分钟。

拿到会徽后，会员就可以参观展览厅和求职中心了。在展览厅，有许多书商和出版机构在展览作品。对书商和出版机构来说，他们愿意把作品介绍给读者。对读者来说，他们也想了解一下新书和新的数据库。在求职中心，那里有好多求职机构的招聘人员在接收应聘者的简历。另外，美国历史协会还提供面试场所供协会会员和求职机构进行面谈。通过准备这样的场所，既节省了求职机构的人力和物力，也节省了求职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对求职者 and 应聘者来说，美国历史协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交谈和协商的场所。

会员注册完毕后，会员就可以参加下午的会议专场了。在年会会场，美国历史协会是这样安排会议议事日程的。1月2日下午，美国历史协会安排了许多会议专场。这些会议专场的时间分别在一点到三点之间，以及三点半到五点半之间。在美国历史协会安排的三个会议场所，会员们纷纷参加他们喜欢的小组报告。当然了，在1月3日到5日的早上，美国历史协会也安排了两个会议专场。总体来说，美国历史协会安排了将近260个小组会议，分散在三个会场。对参会人员来说，这真的是一场学术盛宴。当然了，由于时间上的冲突，会员只能挑选自己最感兴趣的会议小组报告。毕竟，在这么大的学术会议面前，会员不可能参加所有小组报告。

为了促进会员们之间相互交流，年会也安排了众多接待会。1月2日下午有研究生接待会。1月3日下午，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接待会。此外，各历史协会也安排了接待会，如外交史协会接待会、公共史协会接待会和入职两年的青年教师接待会等。在这些接待会上，有

着共同兴趣或工作经历的协会会员会一起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提供了一个供会员相互交流的平台。在参加年会的同时，会员可以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各接待会上，一般有简单的水果拼盘、啤酒、红酒和软饮料。在年会会场，还有许多美国历史协会附属协会的早餐会和午餐会等。在这些活动场所，大家可以相互认识，并结交为好友。在中国，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一般坐到餐桌上大吃大喝去了。大家都只顾吃吃喝喝，参加会议所能认识的朋友就很少了。中国有着悠久的吃饭聚餐传统，这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改变的。不过，我觉得今后国内的史学会议不妨参考一下美国历史协会的这种做法。开史学会议，毕竟大家是去交流学术的。不过，这恰恰是中国历史类学术会议所经常忽视的。

在筹办年会时，美国历史协会年会把会议办得非常职业。为了方便会员，美国历史协会做了一个年会议事日程的应用程序。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会员都可以免费运行这个程序。通过选择各自感兴趣的会议小组，会员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会议日程。这样，通过筛选会议小组后，会员可以立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会议报告。此外，由于美国历史协会发给会员的纸质版年会议事日程只有小组标题和会议论文的题目等，会员看不到论文的摘要和关键词。通过运行这个应用程序后，会员可以看到相应的会议简介等。对参会的会员来说，这很方便。作为一个职业的历史协会，美国历史协会充分考虑了会员的需要。

另外，为了方便会员参加会议，美国历史协会安排了大巴专门运送会员到各个不同会议场所。由于年会有三个会场，美国历史协会安排了大巴把会员从一个酒店运送到另一个酒店。由于酒店之间距离不远，大巴每隔 15 分钟运行一趟。

参加完第 128 届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后，我对美国历史协会的职业性深表佩服！今后，国内要办史学会议，不妨参考一下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筹办方法。

2013年“美国移民、种族与族裔”夏季研讨班总结

欧阳贞诚

2013年6月3日至22日，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美国历史家协会(OAH)联合举办的主题为“美国的移民、种族与族裔”的夏季研讨班，在东北师范大学顺利举行并圆满结束。此次研讨班前后共历时三周，主讲人为来自美国的三位知名教授，参与者为三十余名从事美国移民问题研究或对美国移民问题怀有浓厚兴趣的青年学子，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国内美国问题研究方面较有实力的高等院校。

此次夏季研讨班的举行，得到了中、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支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厦门大学王旭教授与OAH 2012-2013年度主席、美利坚大学历史系艾伦·克劳特(Alan M. Kraut)教授，都出席了此次研讨班的开幕式。不仅如此，作为此次邀请的美方学者之一，克劳特教授还亲自为研讨班学员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讲学。这表明中美双方对此次研讨班的重视程度，也为研讨班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此次夏季研讨班的召开，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OAH两个学术组织之间举行的首次跨国合作，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学界在美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互动和交流，进而提升中国学者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能力与水平。研讨班的成功举行及圆满结束，开创了中美两大学术组织携手合作的良好开端，不仅为深化两国学者的学术沟通与交往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今后两年内中美学术机构即将继续举办的夏季研讨班，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研讨班学习期间，三位美国学者对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潮、反移民的排外主义、移民的适应与融合、散居与跨国主义、身份认同、各种盛行的移民同化理论等内容以及移民史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讲授，并对美国学界关于移民史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热点与趋势等予以全面的介绍。为丰富讲授内容和增强研讨班的趣味性，各位学者还采取了播放纪录片和电影的方式，更加生动、直观地加深了学员对美国移民问题的认识。整个活动期间，学员们求知若渴，热情高涨，纷纷就美国移民、种族与族裔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问题，积极主动地与三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总体看来，此次研讨班的开展，给国内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契机和平台，使他们获得了与美国知名学者面对面进行交流的机会，既丰富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又开阔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学员们也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并期待下次研讨班早日举行。

此次研讨班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离不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及OAH两个组织为开展学术交流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在北京大学王希教授的积极联络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几位代

表于 2012 年初赴美参加了 OAH 的年会,并与该组织洽谈了双方的学术合作事宜。随后,OAH 的代表也于同年 5 月份前来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第十四届年会,并就中美合作事宜做了进一步的协商。此后,中美双方代表就其他一些具体细节问题,通过频繁的通信往来相互交流意见,最终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如互派会员参加对方的年会、在中国连续举办夏季研讨班,并派美国学者前来讲学等正是由于这些有志于推动中美两大学术机构之间的对话的学者们的积极奔走和不懈努力,最终在两个学术机构之间成功搭建起交流的桥梁,从而也保证了此次夏季研讨班的顺利开展。

几位优秀的美方学者的参与,也进一步提升了本次夏季研讨班的学术价值。此次邀请来华讲学的三位学者分别为 OAH 2012-2013 年度主席艾伦·克劳特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华人学者艾明如(Mae M. Ngai)教授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历史系戴维·戈博(David A Gerber)教授。三位教授均长期从事美国移民与族裔问题的研究,为美国移民史和族裔史领域中成就卓越的一流学者。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广阔的视野,幽默风趣且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针对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均不厌其烦地给予详细的解释,让学员们在获得宝贵知识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学术大家的风范。

承办这样的研讨班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涉及到各种繁杂琐碎的问题,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与时间。但是,在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的组织协调下,本次夏季研讨班圆满结束,并达到了理想的预期效果。从本次研讨班的承办单位确定之日起,承办方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在梁茂信教授的带领,相关工作人员便开始有条不紊地着手准备各项事宜,包括与美方前来讲学的学者之间的反复联络、部署培训班的详细日程安排、招募和筛选研讨班学员、准备研讨班的会议场地、给学员提前发放学习准备材料、安排美方学者及中方学员的食宿等。在精心安排与组织协调下,承办方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工作与学习方面,皆为中方学员以及美方学者提供了舒适的环境,保证了研讨班的顺利进行。

此次夏季研讨班委托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承办,是中美组织方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并形成了以所长梁茂信教授为核心的从事美国移民问题研究的稳定学术团队,在美国移民史、族裔史等领域有显著优势。因此,主题为“美国移民、种族与族裔”的首届夏季研讨班选定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无疑与举办方的研究优势相契合,学员们在接受美方学者的学术思想与理念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举办方所拥有的学术资源。

当然,由于是首次举办中美夏季研讨班,并无相关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在某些环节方面,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在研讨班结束之后,举办方工作组也召集了全体研讨班学员进行了座谈,总结心得与经验教训。大家在一致肯定研讨班取得圆满成功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其一,研讨班的举办时间。此次研讨班是在 6 月举行,虽然这个季节长春的气候较为宜人,适合举办此类活动,但对于全国各地高校来说,临近期末,各种考试、研究生开题及毕业答辩等相关事务繁多。所以,有很多青年学者,特别是博士生与硕士生们有意愿参加研讨

班的学习，却因分身乏术而难以成行。就本次研讨班而言，也有部分学员未能按时报到，或是在研讨班期间因事中途退出，难以完成整个研讨班的学习。因此，如果将研讨班推迟至七八月的假期期间举行，青年学子们将会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参与其中，研讨班的效果会更好。

其二，美方学者的行程安排。此次研讨班共历时三周，而三位美方学者是相继抵达长春，各自进行为期一周的讲学，彼此之间没有交叉，同时也可能是由于相互间缺少沟通，三位学者在讲述内容方面也存在部分重叠现象。如果三位或两位学者能共聚一堂，共同为学员们讲授美国移民史，就可以减少讲授内容的不必要重复，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对学员们而言，他们也可以聆听美国学者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路与见解，更有利于拓宽学员们的视野和思维模式。

其三，研讨班的参与人员的范围。部分学员指出，此次研讨班的参与者除了中方青年学子之外，只有几位被邀请的美方专家，人员过于单调。前来参加研讨班的青年学子们热情好学，他们期望在接受美方学者的知识传授的同时，也希望能利用这一机会了解国内学界对于美国移民史研究的最新前沿与热点问题。他们希望国内从事移民研究的中方学者也能参与其中，利用晚上或周末的时间，以座谈或学术报告的方式，丰富研讨班的内容。这样，学员们可以同时吸纳中方与美方学者的学术观点与思想，促进研究的国际视野。

此外，由于中方学员在阅读外文材料和听取英文报告方面，还无法达到像母语那般自如的程度，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解偏差。同时，由于整个研讨班的节奏相对紧张，学员们很少有时间去相互交流心得体会与感受。因此也有人建议，在完成每一个阶段的学习之后，应集中时间组织学员们坐在一起，就自己的收获或疑虑相互交换意见。这样会更有利于消化和吸收美方学者所传授的知识。也有人建议应当加强研讨班的纪律管理，以克服部分学员中存在的散漫现象。

与现任美国历史学家 组织主席艾伦·克劳特教授的短暂相处

王伟宏

本次研讨班是克劳特教授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他先到北京，短暂休息后乘坐动车来到长春。当天晚上，我同师姐吕洪艳一起到长春西站去接克劳特教授，按照之前他与师姐的约定，我们要到站台接他，但后来得知长春的火车站早已不售站台票，所以，我们十分担心进不去站台，接不到克劳特教授。到长春西站后，我们和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我们要接一位从美国来的学者，他一点中文都不懂，希望让我们进站台去接，如果不能按约接到他，他可能会找不到我们。感谢站内工作人员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我们得以从候车室进入站台。我们进去十

分钟后，克劳特教授所乘坐的动车抵达。我们在他所在车厢外等候，只见一位身着西装、身材微胖、花白胡须、年近六十左右的外国人走下火车，他就是 OAH 现任主席艾伦·克劳特教授。我和师姐迎上去，师姐之前在美国参加 OAH 的年会时已经和克劳特教授认识，他们热情的招呼之后，师姐向克劳特教授介绍我，我们握手寒暄，他握手时非常热情、有力。我帮他拿其中最大一个行李箱和手提包，他表示非常感谢，说这里面有很多书籍，所以很重。出站后，我们乘车前往已经为他预定好的宾馆，路上师姐向克劳特教授介绍了长春以及东北师大的一些基本情况。克劳特教授也问我有没有去过美国，研究什么主题，我都一一作答。到了宾馆，办理好人住手续后，我们把他送到了宾馆房间后返回。离开时，克劳特教授向我们再次握手言谢，我们也表示，希望他在长春这段时间生活愉快。

两天的休息调整后，克劳特教授用四天半的时间为研讨班的学员讲授美国移民史。每天上午，克劳特教授都会提前半小时到达上课地点。克劳特教授为了不使大家上课太过疲惫，只在每天上午进行讲授，下午的时间他会让大家观看与美国移民史有关的电影或纪录片，之后会进行一些相关讨论。克劳特教授讲课时，思路明晰、娓娓道来还不乏幽默，他对美国移民史研究的全面和精深程度令我们学员叹服。而且，克劳特教授每天都会自掏腰包邀请五名研讨班学员和他共进午餐，我有幸两次同克劳特教授共进午餐。用餐期间，克劳特教授会逐个认识学员，了解学员的学校背景，询问学员的研究主题，并且给出极有价值的建议。尽管提问的学员很多，但克劳特教授依然十分有耐心的认真解答每一位学员的问题。这令我们非常感动，不曾想当代美国最顶级的历史学家竟是如此平易近人，他对我们中国这些后学小辈竟是如此关爱有加。为了表达对克劳特教授的感谢，我们部分学员一起邀请克劳特教授到长春著名的“老昌春饼”品尝中国特色美食，他对此非常高兴，并对长春的“春饼”赞不绝口。我们对克劳特教授的另一个印象是，他精力特别旺盛，每天午餐后，他都不需要回宾馆休息，而且下午还是那么精神抖擞。有时午餐后，我们几个学员会和克劳特教授在校园里转转。有一次走到历史文化学院后面那片树林，我们向克劳特教授介绍那有几尊雕像，其中有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奠基者之一丁则民先生，也就是王旭教授和梁茂信教授等人的导师，克劳特教授当即走近瞻仰，他那种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前辈的敬意令我们着实感动，他还和学员们一起在丁则民先生塑像前合影留念。之后，我们带克劳特教授参观了历史文化学院内的一些学生活动展览，他还和亚洲文明研究院的同学切磋台球球技，那位同学对此也感到非常荣幸，能和美国 OAH 主席切磋球技，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

克劳特教授的学识和修养令我们学员心存敬意，为了表达对克劳特教授的敬佩和感激，我特意赠送给他一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绘有“祥龙图案”的扇子以做纪念，他非常高兴。令我感到特别欣喜和荣耀的是，克劳特教授竟赠送给我一本他的专著 *The Huddled Masses: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Society, 1880-1921*，并签字留言。前几天克劳特教授给我发来邮件，还提及我送他的那把扇子，他将其放在办公桌旁的书柜里。同时，克劳特教授希望我和他一直保持联系，能够不断向他告知我研究主题的进展情况，他将会向我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这些都令我受宠若惊，我定当珍惜克劳特教授对我这个中国后学小辈的厚爱。另外，克劳特教

授的课程讲授结束后，我们特意把几天来他与我们学员、也包括与梁茂信教授的合影做成一个小影集赠与他，并附上我们的留言和签名，他对此十分感动。课程结束当晚，梁茂信教授设宴欢送克劳特教授，研讨班全体学员参加。在欢送宴上，克劳特教授表达了他这次中国之行、长春之行的感受，他对我们学员学习研究历史的热情、真诚表示感动，并对东北师大美国所热心周到的组织服务表示感谢。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和同门李敏一起送克劳特教授到长春站，他要先到北京和天津讲学交流，然后回国。临行前，李敏还特意赠送给克劳特教授一盒东北特产（鹿茸），他对此表示特别感动。我们原打算一起把克劳特教授送上火车，但是长春站的工作人员只卖给我们一张站台票（本来不售站台票，这已经属特殊照顾）。所以，最后我一个人把克劳特教授送到他所乘坐的车厢和座位，帮他放好行李之后，与他道别。虽然，我与克劳特教授相处的时间短暂，而且自己学养浅薄、外语又差，未能与克劳特教授进行学术上的深度交流，但是，克劳特教授那种和善的品格、深厚的学术底蕴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最重要的，与克劳特教授结下的深厚友谊必将使我受益终生。

北京大学美国史方向博士生出国交流情况统计

于留振

姓 名	年 级	出 国 项 目	留 学 单 位	国 内 导 师
曹 鸿	2008 博	富布赖特项目	哈佛大学	李剑鸣教授
滕延海	2009 博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耶鲁大学	李剑鸣教授
翟 韬	2009 博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王立新教授
王 禹	2010 博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威斯康星大学	李剑鸣教授
王睿恒	2010 博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弗吉尼亚大学	王立新教授
于留振	2010 博	富布赖特项目	哥伦比亚大学	王希教授
杨 钊	2011 博	富布赖特项目	普林斯顿大学	李剑鸣教授
杜 华	2011 博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耶鲁大学	李剑鸣教授
何 芊	2012 博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宾夕法尼亚大学	李剑鸣教授
邵 声	2012 博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哥伦比亚大学	王希教授
史宏飞	2012 博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哈佛大学	王立新教授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索尼娅·米歇尔教授做客东北师大

欧阳贞诚

2013年11月20日，应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及美国研究信息中心的邀请，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研究项目主任、马里兰大学教授索尼娅·米歇尔（Sonya Michel）为历史文化学院的师生们做了一场题为“美国历史中的性别、种族与族裔”的学术报告。

米歇尔教授通过展示美国各族裔妇女“刻板形象”（stereotypes）的变迁历史，对美国社会中性别、族裔、阶级元素相互交织下的少数族裔妇女问题作了分析。她认为，来自主流社会的种族偏见，与少数族裔的自我认知，建构出了少数族裔妇女的刻板形象，而这一形象并非基于各族裔的文化特性，而是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特定产物。与此同时，强调对既有观念形成过程的解构，将会深化甚至会推翻我们对旧有问题的认知。报告结束后，针对师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米歇尔教授予以详细而生动的解答。当天下午，米歇尔教授与美国所的师生聚在一起，举行了圆桌会议，就美国历史中的许多学术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米歇尔教授根据在场同学的专业方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同时也分享了自己的治学经验，展示出了美国学者的研究特点。

浙江大学美国研究所 2013 年下半年学术活动集锦

金将将 钟丽雯

2013年9月9日，应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欧美所邀请，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暨世界史所所长刘国柱教授，在该中心发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大陆”的演说，并与该中心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

2013年10月18日，美国东北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瑞克·艾尔伍德（Rick Arrowood）教授访问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做了题为“美国教育系统的非赢利组织”的学术报告，并与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及世界史所的师生进行了交流。

美国富布赖特学者、西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蒂莫西·罗伯茨（Timothy M. Roberts）